

# 文教風雲人物誌 (一)

## 我所認識的胡適和蔣夢麟

● 劉真 (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我從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到現在，一直從事文教工作，經常會晤的也以文教界人士為最多。其中已經逝世卓有成就者，均有人為其作傳。不過這些傳記的內容，多偏重於較嚴肅的一面，以其學術、文章、道德、事功為主。這種傳記固然重要，可是我想如果能由這些人平時待人接物的細微處加以介紹，也許更可由小見大，從平凡的地方看出他們不平凡之處。我現在所要談的，只限於已經逝世者。我的用意一方面固在發潛德之幽光；另一方面也希望年輕的一代都能見賢思齊，像他們一樣，成為受大家永遠尊敬的知識分子。

### 胡適本意無所適從

我想要談的第一位是胡適先生。

胡適的傳記很多，大家也都很敬仰他

。他生於清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胡適晚年來臺主持中央研究院時，由於和我是安徽同鄉，常常約我在星期日到南港小聚聊天。

胡適是安徽省績溪縣人，本名是胡洪驊，後改名為胡適。一般傳記對於他之所以取名為胡適的記載，多半是說他在上海求學期間，讀了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其中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語，因而改名為胡適云云。但是胡適親口告訴我，他初到上海求學時，是就讀於澄衷中學，後來因志趣不合，而轉學至中國公學。王雲五恰巧是他的英文老師。後因中國公學鬧學潮，他遂離開中國公學。在這一段期間內，他生活上覺得非常苦悶，有一晚還

被巡捕房抓去，因而對未來更感到徬徨。此時正逢北京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招考學生，他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消息後也想去應考，所以就取名胡適，意思是「無所適從」，不曉得要到那裏去之意，乃以胡適之名報考。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八月，胡適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官費生，由北京到上海，坐船赴美。進入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科，一年半後，改習政治經濟，兼治文哲。民國三年六月，大學畢業隨進入研究院。次年九月轉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習哲學，這也是胡適一生的轉捩點，他受到杜威博士實證哲學的影響，故一生治學特別注重證據，常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民國六年五月，完成博士學科考試。七月返國，八月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請，

至北大任教授。十二月，與已訂親之江冬秀小姐結婚。胡先生事母至孝，在他出國這段期間，他的寡母多賴未過門的媳婦江冬秀來照顧。江小姐乃是一纏腳的鄉下女子，書也讀得不多，以當時胡先生的聲望、地位來說，不知道有多少名門閨秀視為如意郎君，但是胡適還是遵從母命，娶了江小姐為妻。

### 理想的總統候選人

民國三十六年行憲之初，由於當時局勢混亂，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曾在中央委員集會中表示：第一任總統最好不要由國民黨黨員來擔任，以示國民黨天下為公的精神，最好由具有聲望的社會賢達來出任總統一職。並認為胡適是最理想的總統人選。但後因一部分常務委員反對而作罷。三十七年行政院改組，蔣中正總統想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長一職，但亦為胡婉拒，他一生無意從政，只願作一位執政當局的諍友。

民國四十一年秋，臺大校長錢思亮和我聯名寫信邀請胡適回國講學。胡適遂至臺灣大學講授治學方法，在師範學院講授杜威哲學，為時共兩個月。在這兩個月期

間，我與他常常見面，彼此也更為了解。胡適善飲，時常小酌兩杯，又會講笑話，為人風趣。雖然我是他的晚輩，他總稱我白如兄。

民國四十二年，師範學院要成立家政系、工教系。這兩個系的成立是與美國賓州大學合作的，所以我就應邀到美國考察訪問一年，並經常住在賓州大學校區。我四十二年二月由臺北飛抵華盛頓時，胡適正在華府我國大使館作客，他聽到我來的消息，就留了一張名片給大使館的秘書，請秘書通知我有空時到紐約和他聚聚。我到賓州大學後，便寫了一封信給他。約定四月的復活節，前往紐約拜會他。

胡適住在紐約中央公園附近一座公寓裏的五樓，我到紐約打電話給他時，他仔仔細細地告訴我往他家的路線，以及公寓的標誌等等。當晚，他特邀請梅貽琦和我共進晚餐。胡適的公寓很小，不到三十坪，由胡太太自己下廚，他則親自端菜。由於胡太太係裹小腳，不通英語，胡適又不會開汽車，所以買菜都是叫市場的人送到家裏來的。梅貽琦也善飲，在席間說了許多話。可是我曾聽說梅氏以前和趙畸（字太侔，山東人，北大畢業，專攻戲劇，曾

任山東大學校長）兩人在北京會晤時，因彼此都不擅言詞，見面時只各自抽支煙就分手了。因為我知道梅先生不愛說話，但是那天卻看到梅先生喝了很多酒說了很多話，於是便把我過去聽到這件事提出來問梅貽琦是否確係如此？梅貽琦笑笑說：「我不記得了。」胡適藉這次機會，介紹梅貽琦和我認識，最主要的用意是想讓我和梅氏談談如何運用庚款補助師院的有關事宜。中央政府撤退之前，行政院改組，發表梅貽琦任教育部長，梅氏沒有接受，於國外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會議之後，就旅居美國紐約。清華大學有一筆基金存在美國的銀行，由梅貽琦負責保管。梅氏就拿這筆基金的利息幫助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臺灣的大學校。梅貽琦知道師範學院設備不足，就答應補助五千金給師範學院。由此可見胡適樂於助人，他請我和梅貽琦吃飯，目的並不在吃飯，也希望我能認識一位教育界的前輩。胡適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名譽館長一年，他囑咐我一定要去普大參觀，並打電話通知當時的館長童世綱，要他替我安排妥當，由此可見胡適做人做事的週到。

## 從不替人寫介紹信

民國四十六年六月，美國全國教師聯合會在費城召開，我以貴賓身分應邀出席。路經紐約時，胡適又要請我吃飯，我知道他剛因腸胃病動過手術，應該在家休養，不宜外出吃飯，就婉謝了。在我開完會將離美返國前，他忽然打電話到旅館對我說，他不能到旅館話別，可是有一件事令他覺得非常高興，他一定要告訴我。就是李田意教授對胡適說，一年前在日本費了很多時間，才找到「拍案驚奇」的古本，就用照相翻拍下來，這些寶貴的資料郵寄又太重，而且他也不放心，我就答應把這份資料親自帶回臺灣給正中書局出版。而我自己的行李，則託師範學院畢業在美國深造的學生郵寄回國。胡適認為我能為國外學人熱心服務，深表佩服。後來這本書在香港出版，李田意特在前言中，提及此事表達謝意。

那時候紐約有個華美協進社，社長是孟治，有一天舉行餐會歡迎我，胡適也出席了這次的聚會。剛巧胡氏和夫人在我前面到達，我親眼看見胡適在來賓的簽到簿上先簽胡江冬秀的名字，然後才簽自己的

名字。他一生提倡新思想，可是卻實行舊道德，夫婦相敬如賓，白頭偕老，一直為人稱道。

民國四十七年春，胡適應聘回臺灣主持中央研究院，有一次我宴請臺大客座教授趙元任、楊步偉夫婦，並邀梅貽琦和胡適作陪。胡適從南港來時，還帶一瓶「菊」正宗日本清酒來，因為他知道我和內人都是留日的，所以才會拿一瓶日本清酒給我們共飲。我在教育廳服務期間，胡適有一次對我開玩笑的說，我作了官卻替他帶來不少麻煩。因為有許多人知道他和我是同鄉，常有人拜託他寫介紹信給我，希望能獲得中學校長職位，胡適曾坦率的告訴這些人，他說你如果真的是個當校長的人才，不妨毛遂自薦，不必託他寫介紹信，胡適說他從來不寫推薦人的介紹信，以增加朋友的麻煩，胡適這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態度，便是儒家忠恕之道的表現。

大家都以為胡適只注意國家大事，其實他也很關心小事。中央研究院旁邊的舊庄國小，當時等於是中央研究院的子弟學校，有一天胡適向我談起，這所小學缺乏給水設備，更沒有操場，希望教育廳幫一

點忙，我就告訴他，舊庄國小屬於臺北縣教育局主管，我會補助臺北縣一筆專款，由臺北縣教育局設法改善。舊庄國小在半年後操場落成，給水設備完工，胡先生便寫了一封信給我，邀請我參加落成典禮，並對我說了一些感謝的話。當時校長是馬袖宇女士。我們在典禮上照了幾張照片，前幾天我把它送給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主任委員呂實強，以為留念。

蔣中正總統為表示對胡適的尊敬，特親自參加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典禮，因為中研院有許多人與北大有關聯，蔣總統在典禮中對五四運動頗有微詞，胡適在蔣總統致詞完畢後就立刻對蔣總統說：「總統，你錯了！五四運動純粹是一種文化運動，與以後的左傾思想與共黨活並無很大關係。」這一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蔣總統聽後並無不快之色，這一方面顯示了蔣有容人的雅量，而另一方面胡適所表現出來的知識分子風骨，也令我非常欽佩。

## 是非分明不討好人

胡適在回臺灣之前，在美國的日子很清苦，據說只有三千美金的存款。但是因

為朋友多，所以日子過得並不寂寞。蔣總統對胡適一直非常敬重，在民國三十八年引退前，曾特別聘請胡為總統府資政，聘書是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親自送交的。胡適旅居美國期間對國內政治仍相當關心，不過他曾向我表示，他在國外從不對外國人公開批評政府，回國後他卻要作政府的諍友，這是他一生做人的原則。他公而忘私，是非分明，可以說真正是所謂「國士」的典範。

在我擔任教育廳長期間，他到臺中的北溝避壽，他離臺中時邀我和孔德成一起坐他的車子回臺北，以便在路上聊聊天。那一次在三小時途程上，天南地北，說了很多，經過新竹市時並下車在一家咖啡館中喝了一些咖啡。胡適因有心臟病，所以身上總帶一小瓶白蘭地酒，以便心臟稍感不適時，喝一點幫助心臟跳動。胡先生一向愛熱鬧、而且言談風趣，所以任何人與他相處，無不為他待人接物的風範所感動。

胡適非常樂意幫助青年人，他回國後的第一次演講是在三軍球場舉行的。陳之藩也去聽講，會後就給胡適寫信。陳之藩在浦城街的國立編譯館工作。他向胡先生

提到，為什麼不繼續寫中國哲學史下半部呢？胡先生告訴他：「因為隋唐以降，中國的哲學思想受到佛教禪宗的影響很深，而他本人對這方面研究尚不成熟，所以不敢貿然執筆」。他們二人也因通信而建立起友誼。有一天，陳之藩到臺北市雲和街梁實秋的家中聊天，我也在座。陳之藩表示想出國留學，但苦無兩千美金的保證金。梁實秋便提到胡適存有一筆錢，是專門用來幫助青年留學用的。於是梁便寫了一封信給胡適，胡立刻答應下來，並開了一張美金支票給陳之藩。在陳之藩臨出國前，胡適向陳之藩表示他的散文寫得很好，如果到美國留學，是否可以考慮改習文科，再從大學部開始讀起，經費方面，他願意負責籌助，因為胡適認為文學家不易培養，凡在這方面有天才的人，應該加以鼓勵。陳之藩到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就讀後，覺得如果改學文學將會很難找到工作，所以陳之藩還是繼續學電機，並未改學文學。以後得了博士學位，就在美國教書。另外有一位師大理化系助教也是同樣獲得胡適資助，才能繼續前往美國深造。

胡適對他的學生也非常照顧，有一位中國公學畢業生羅爾綱（廣西人），曾隨

胡到北平，任胡氏的家庭教師，同時也替他整理文稿，在胡家中做了幾年之後，適巧清華大學講授近代史的蔣廷黻因出任駐蘇俄大使，中國近代史這門課，清華大學有意請羅爾綱來接替蔣的職位，胡適聽見後，向清華表示不大贊同。羅以後知道此事，很不諒解他的老師。胡適後來坦率的對羅說，蔣的課你怎能接下去，做事情如果第一次做不好，將來對你有不良的影響。胡適對人公道，做事負責，決不循私，更不會討好學生。後來羅爾綱了解到胡適對他的用心，頗為感動，曾出版了一本「師門五年記」，亦提及此事。羅爾綱一直留在大陸未來臺灣，胡適對這本書很滿意。有一次，我帶我的第二個兒子劉捷生到中央研究院看胡適，胡適和捷生談得很高興，曾把這本書送給捷生作紀念。

### 暗助王世杰獲平反

民國五十一年春節，我因公須到臺中小住，特別在春節前二日，偕同內子前往胡適寓所提前拜年。那時胡適正在寓所養病，我為了不願打擾他，只留了名片給他的秘書，胡適聽到我和他的秘書談話的聲音，特地從房裏跑出來，手中還拿著稿紙

內人遂向胡先生說：「胡先生要養病，不要再寫文章了。」胡先生答道：「不寫文章，活著幹什麼！」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中研院召開院士會議，下午胡先生在茶會中致詞時，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在他出殯安葬之日，蔣總統特別寫了一副輓聯送到殯儀館，聯文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真是對胡適一生最好的寫照。

另外有件事也頗值得一提，王世杰當總統府秘書長時，因為幾架民航機在香港未能飛返臺灣，有人誣陷是由於他處理公文不當所致，蔣總統大為震怒，明令撤職查辦。王不久又因走路跌斷了腿，住進醫院，胡適特地打電話給老總統的秘書，要他以總統的名義去慰問王世杰以示蔣總統對王仍極關切。這是胡適替人辯冤白誦的表現。胡適不久又請行政院陳誠院長發表王世杰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做為一種變相的平反。我深佩胡適一輩子行忠恕之道，處處體諒他人，樂道人之善。他在北大當文學院院長時，曾請並無很高學歷的小說家沈從文去教書，他很樂意提拔人才。錢穆原來是無錫師範學校的教員，他寫了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反駁康有為的說法。顧頡剛看了這篇文章，就介紹錢穆到燕京大學當講師，不久胡適將他延聘到北大講授中國通史。錢穆素不贊同胡適的某些學術見解，但是胡適卻能聘他任北大教授。又如顧頡剛是介紹錢穆到燕京大學講學的，可是在顧的古史辨一書發表後，錢穆曾為文表示反對。足見老一輩的學者，對治學和待人都有包容的胸襟，在學問上彼此雖有爭論，但友誼卻能長存。很多人在胡適去世後，都說胡適是中國近代難得一見的完人。他一生關心政治而不熱中政治，但開風氣不為師。就我所認識的當代學人中，胡適是最值得敬佩的一位。

### 遭人指責從不介意

記得民國四十二年春我在美國時，看到「自由中國」月刊上有一篇讀者投書說，據傳師院師生有人建議因我對學校有很大貢獻，應立一紀念碑，但卻受到某些教授的反對。這根本是有人造謠惡意中傷，我看到後內心頗為難過。因為胡適是「自由中國」的發行人，所以我特向他提到此事，他勸我萬勿介意，更不可生氣。他並以自己為例說，在民國二十年左右，任

卓宣用葉青筆名，曾寫過一本「胡適與郭沫若」在上海出版，對他大張撻伐。這幾年他每次回臺灣，總看到這一類的小冊子，更有一位臺大教授寫了一本「胡適與國運」公開指責他，他都一笑置之，從不介意。古人說：「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很懇切的安慰我，要我能容忍一切不實的謠言和惡意的中傷。當年在紐約胡適所說的這番話，對我有極大的啟示作用，所以我多年來，做任何事都只問是非，不計毀譽，尤其擔任行政主管，更需要抱定「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態度。胡適雖已逝世多年，他的思想學術，至今仍尚有爭議，但就他的人格風範而言，我相信他終究是一位永遠值得崇敬的不朽人物。

### 蔣夢麟秀才洋博士

蔣夢麟，清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日）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病逝。浙江餘姚人，是王陽明的同鄉。蔣夢麟十二歲時，入紹興中西學堂就讀，蔡元培先生於戊戌政變後，回家鄉紹興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等於今日的校長），所以蔣常稱蔡元培先

中生為老師，就是有這一段因緣的關係。

光緒二十九年，蔣夢麟中秀才。三十年，進入上海南洋公學就讀。三十四年八月，赴美留學，入加州大學農學院肄業。所以他後來主持農復會時，就表示：對於農業，並不是個門外漢。次年秋，蔣夢麟轉入社會科學學院，以教育為主修科目。民國元年，在加州大學畢業，再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研究所，民國六年六月，獲得哥大哲學博士學位。

學成歸國後，初至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第二年辭去編輯職務，創辦「新教育」月刊，這個刊物一共出版了十卷。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代表蔡元培到北大暫理校務，遂應聘為北大教育學教授，於七月間到達北京。九月，蔡元培回北大，蔣夢麟又兼總務長（當時的總務長綜理全校校務，與今日的大學總務長不同）。九年十月，蔡校長赴歐，蔣夢麟便再度代理校務。蔡於次年九月回國。民國十二年一月，蔡元培因抗議彭允彝「蹂躪人權」辭職，蔣夢麟乃第三次代理校務。十二月，北京政府並正式任命蔣夢麟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

我所認識的胡適和蔣夢麟

民國十六年五月，蔣夢麟出任浙江省

教育廳長；六月，因中央政府實行大學區制，蔣夢麟復被任命為第三中山大學校長。八月一日，第三中山大學成立。民國十七年十月，繼蔡元培先生為大學院院長，十月二十三日，廢止大學院制度，恢復教育部，蔣夢麟即出任教育部部長。十九年十二月四日，辭去教育部部長職務，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據蔡元培自述，其中特提及蔣夢麟做事有決心、有理想、有擔當。由於上海一地大學過多，良莠不齊，蔣夢麟主張大學應重質不重量，所以出任教育部長時，便大力取締若干所謂的「野雞大學」。其中有一所「勞動大學」，為黨元老吳稚暉等人所創辦，吳稚老曾親自到教育部部長室，面斥蔣「沒有古大臣風」，蔣遂因此憤而去職，重回北大當校長。

北大的劉半農教授還為此戲刻了一方「無古大臣風」的印章相贈，蔣也常以此印自嘲。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這一段時間內，蔣夢麟對北大確有許多重要的革新，使北大愈成為全國的學術重鎮。

### 主農復會改革農業

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爆發後，北大、南開、清華三所大學，於十一月在湖

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二十七年五月，遷至雲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由原來三個大學的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蔣夢麟與梅貽琦、張伯苓以常務委員身分，共同主持校務。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忙著國民參政會的事務，所以實際負責校務的，則為清華校長梅貽琦與北大校長蔣夢麟兩人。蔣夢麟先生並自三十年七月起，擔任紅十字會中國總會會長。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長宋子文，邀請蔣夢麟為行政院秘書長，三十七年八月，蔣夢麟被任命為「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即農復會）」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是由美援支持成立的，屬於中美兩國共同合作的機關，所以性質較為特殊。舉凡職員的任用、待遇等方面，都與其他政府機關不同。三十九年，農復會遷來臺灣後，即積極展開工作，對農村發展貢獻甚大，如改良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農民生活水準，協助政府推行土地政策，組織四健會，推行家庭計畫等等。蔣夢麟是一位有遠見的人，臺灣土地太小，如果不推行人口計畫，將來一定會產生許多問題。這個運動當時曾受到一部分立法委員的攻擊，認為他違背國父遺教的民族主

中義。但蔣夢麟卻不顧一切的誣讒，甚至聲稱即使被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也要堅持到底。後來他又兼任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四十七年，獲頒菲律賓賓總統麥格賽賽獎，肯定其對復興中國農村的貢獻。

蔣夢麟不但能坐而言，而且能起而行。他做事情很講究方法，比如要改良農業生產技術：他主張要由農復會主動地去找農民來，相互溝通，向農民說明農復會的動機和做法，而非把農復會當作一個衙門，等待農民來求助於農復會。例如凡農民有需要資金和協助改良生產技術者，農復會均貸予資金，並派專家下鄉實地調查後予以有效的協助，切實解決農民的困難。他的這些作法，對我有很大的啟示。我在教育廳服務期間，認為欲增進國民受教育的機會，及減少政府教育經費的負擔，必須鼓勵私人興學。可是真正的教育家，都沒有錢創辦學校，反而有些人卻以辦教育為名，把學校辦成了學店，以達到其個人牟利的目的。所以當時我興起設立教育銀行的念頭，提供貸款給真正想辦學的教人士去創設私立學校。使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齊頭並進，負起為國育才的使命。

這與農復會主動貸款給農民改善生產技術的理念與做法是完全相符的。

### 動植物不無理取鬧

四健會每年都要開一次年會，由農復會、農林廳、教育廳三個機構合辦。因而我有機會和蔣夢麟經常見面，並且來往也較密切。由於他是教育界前輩，我就教於他的機會很多。我曾同楊亮功（時任師大教育系主任）一道去邀請蔣夢麟來師大講演，他很謙虛的表示，離開北大後，就絕口不再談教育問題，因為有關教育的問題，人人都有意見，人人都自認是專家，爭論不已，徒增煩惱。自從主持農復會以後，服務的對象非常單純，不外是動、植物，牠們不會無理取鬧，撥弄是非。所以他覺得在農復會工作很有成就感。對與農業無關的問題不願多說。因而婉謝在師大的講演。由於主持農復會的關係，他經常有機會到日本去訪問，看看日本農村的實際情況。當時他已經七十多歲，辦公地點在南海路，家住在中山北路三段，車程約需三十分鐘。有一次他來師大開會，到我的辦公室小坐，順便從口袋裏拿出一本「日語會話」的小冊子給我看，並說他正在加

緊學習日文，經常利用坐在汽車上的時間背誦日語，希望以後能以日語和日本農民交談。這種老而好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蔣夢麟雖然擔任北大校長多年，但是卻沒有一點本位觀念，他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理念和原則。當時有幾所大陸的公立大學在臺復校，有人向他勸說，北大歷史最悠久，何不考慮在臺復校？可是蔣夢麟卻認為：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主要由於北大有最好的教授，如今在臺灣，那能聘請到像當年北大那樣水準的教授，倘若貿然復校，豈不砸了北大的招牌？所以只要他在臺灣一天，就絕不考慮北大復校，這也就是他一生所堅持的大學應重質不重量的原則。從這件小事，便可看出他的氣度和風範。他的見解和胡適完全相同，胡適抗戰勝利後，即表示政府應集中力量，先在國內辦好五所大學，不要一味增設很多有名無實的大學。等到把這五所大學先辦成第一流的大學以後，再陸續使其餘的各大學都能達到國際上著名大學的水準。所以我在教育廳服務期間，便是本著這種理念和原則，辦理高等教育。當時省政府教育經費並不充裕，所以決定將現有的

三所省立大學即師範大學、成功大學和中興大學辦好，再在各項條件許可後，慢慢發展高等教育，以免大學過於浮濫，成為文憑製造廠，並不能發揮研究高深學術和培養專門人才的功能。

### 面對問題見解獨到

蔣夢麟國學根柢深厚，對每一問題均有其獨到見解，他的文章和他的為人一樣，極為風趣灑脫，耐人尋味，例如所著「西潮」一書，便很受讀者歡迎。此書原係以英文寫成，後由中華日報譯為中文發表，並以專書出版。他在農復會期間，原擬再寫一本「新潮」作為西潮的續編，可惜未能完成就去世了。他還向我表示過，預備在由農復會退休後，寫一本「中國思想史」，惜未能如願。我想如果他晚年不擔任行政職務，以其「學貫中西」的條件與多年辦學及從政的豐富經驗，必可寫出幾本極具價值的著作。

蔣夢麟與我雖係到臺灣後才開始結識，但卻相知頗深。民國四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他寫給我一封長信，說明他主持農復會的理念與做法，頗可供今日一般政府決策人士及推動實際業務者的參考，特附錄

於後：

白如吾兄勳席：

頃奉本月十七日

惠教，多承藻飾，愧不敢當。惟該文所舉各點，確係農復會十年來時刻勉力遵循的途徑。行遠自邇，故農復會多數計畫係從小規模實驗開始。成效既著，步驟已定，擴大推廣，自容易矣。弟常謂「We cast our eyes upon the stars. We set our feet to the grass-roots.」我們把眼光放在遠處，把雙脚踏在實地」，即是此意。知實務，而乏理想，則無法對社會作較高一層的貢獻。有理想，而無方法，則理想只是空想，永無實現可能。余最佩服美國老羅斯福總統

的下面幾句話：「If a man does not have an ideal and try to live up it then he becomes a mean, base and sordid creature, no matter how successful he is. If on the other hand, he does not work practically,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he is in the world of actual men and must get results, he becomes a worthless head-in-the-air creature, a nuisance to himself and everybody else.」-Theodore Roosevelt。特錄奉吾兄參考。今後尚祈隨時賜教，用匡不逮。吾

兄熱心任事，有抱負、有理想；又能從切實根本處逐步求問題之解決，實與本會工作宗旨不謀而合。近年省教育行政甚多良好之興革，此皆吾兄領導之功。因風寄意，順致欽佩。崑頌

弟 蔣夢麟拜復 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 推行人口政策被罵

民國五十二年春，我離開教育廳後不久，他那時正在石門水庫招待所養病。有一天張研田兄約我一道前往探視，蔣夢麟一看到我就說：「多做事是有罪的」。這自然是有感之言。因為農復會的業務本來很單純，只是他覺得臺灣地小人稠，他看到農村人口增加甚速，所以大力提倡家庭計畫和人口政策，不料卻遭到若干民意代表的質詢和辱罵。因而他覺得在當前這個社會上，多做事便替自己增加很多麻煩，最好少說話少做事。這固然是他自己的一種無奈的慨嘆，同時也是用這句話來安慰我，因為我在教育廳長任內也由於創立教師福利制度和興建教師會館，曾受到一些民意代表的質詢而感受到很多困擾。

關於他晚年續絃的經過，我也瞭解得



很清楚，他是在臺北市居浩然家裏由端木愷律師證婚的。當天中午到達臺中市，周至柔主席特設宴請他和新婚夫人徐賢樂女士，我也應邀做陪。蔣夢麟餐前把我拉在一旁笑著對我說：「白如兄：上星期我已經到醫院做過體格檢查，一切正常，我絕對不會害人！」蔣夢麟的風趣，由此可見。席間他曾向我說，他與他的新婚夫人很想當晚下榻日月潭教師會館，共度新婚之夜，不過聽說教師會館不招待政府官員，只招待中小學教師，他有沒有資格去住？我當即對他說您曾當過教育部長、北大校長，而且農復會主任委員也不是政府官員，你願意以教師會館做洞房，乃是教師會館的光榮，當然竭誠歡迎，所以當晚他們新婚夫婦就住在日月潭教師會館。

講到這裏，不禁讓我想起蔣夢麟與教師會館實在有不尋常的「因緣」。我離開教育廳以後，有一年四健會在臺中教師會館舉行展覽會，當他巡視會場時，一不小心，就滑倒了，因腿部受傷頗重，就由臺中送返臺北榮民總醫院診療。我在報上看到這則消息，就趕往榮總去看他。我說教師會館是我興建的，你在那裏跌倒受傷，我內心很覺不安，他笑著對我說，只怪他

### 晚年續絃自找麻煩

自己不服老，不肯拄拐杖。孰知後來經過榮總體檢的結果，除了骨傷外，還患有癌症，以致一直住在榮總治療並在榮總逝世。

蔣夢麟晚年續絃，也是他一生最不愉快的消息。最初報紙上透露他將與徐賢樂結婚的消息，便有很多他的好友加以勸阻，有一次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處談天，胡便向我提及此事，他說蔣夢麟已經七十歲了，娶個年輕的太太，難免不當寡婦。

如感一個人生活孤寂，不妨找個年齡稍大的特別護士，陪他住在一起，何必續絃自找麻煩。胡先生又說他曾寫了一封長信請農復會秘書長樊際昌交給他，不過他說以蔣夢麟的個性恐怕不會接受他的意見，甚至連他的這封信都不願拆開來看。果然結婚不到數年，便發生糾葛，雙方聘請律師，到法院打離婚官司。有一天我遇見樊際昌談及此事，他說離婚官司絕對可以勝訴，因為新婚之夜，徐賢樂曾一再問及蔣夢麟的經濟狀況，包括動產與不動產等等，蔣夢麟便在教師會館的便條紙上，一一開列出來給徐女士看。這張教師會館的便條

紙，蔣夢麟一直保留在身邊。後來蔣夢麟的律師把這張便條紙拿到法院給法官看，證明徐賢樂對蔣夢麟並沒有真正的愛情，否則何以新婚之夜詳細查詢他的財產，結果法官採信了這件證物，蔣夢麟的離婚官司總算打贏了。

蔣夢麟所以在學術與事功兩方面，均能有卓越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崇高的理想，並能以實際的方法實現其理想。

不論在教育界，在北大，在農復會，凡由他主持的機構，都能特立獨行，擇善固執，不做鄉愿，不計毀譽，在臺灣我所認識的教育界前輩中，他是最敬佩的一位。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